

དར་མདོ་རྫོང་རིག་གནས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ས་ཀྱི་རྒྱ་ཆ་བདམས་བསྐྱེགས་།

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

དེབ་དང་པ

第一辑

ཆབ་སྐྱོན་དཀར་མཛེས་བོད་རིགས་རང་སྤྱོད་ཁུལ་དར་མདོ་རྫོང་ཁྱེད་ལྷན་ཁྲུང་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

ཁང་ནས་བསྐྱེགས་།

委员会编

前言

我县建制较早（雍正八年，公元1730年）地域辽阔（10,500平方公里）早为明正土司驻牧之所：又是各派宗教荟集之地（全县各派喇嘛寺共三十七所，汉族庙、祠一坛三十余座）：藏贸易的中心：康藏交通的枢纽！哲孟贡、（锡金）廓尔喀（尼泊尔）毕绷子（克什米尔）入贡必经之道。同时，又是清时打箭炉厅和民国时川边镇守使的驻所，后为西康省省会。今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。她史料繁多，传说不少。历史上，由于民族杂居，语言风俗迥异，交通阻塞，文化落后，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如凤毛麟角。即使有少量记述，不是嫌其过于简略，便多有错讹不实之处。

根据全国第五次文史工作会议和省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，在州、县党政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，在县政协党组的直接领导下，我们以“求实存真，广征博采”和“文史工作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”为指导思想：将陆续把我们“抢”到的部分碑文和征集到少量文物及一些“三亲”资料和传说等慎重地反复查证，编辑成册，作内部发行，以资抛砖引玉。

由于我们编辑水平、翻译水平有限、错误难免，敬祈各界人士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1987年10月

编 辑 凡 例

1、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，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资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，因此，本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。

2、本县地域因有折多山横亘其间，故有“折东”、“折西”之分，本辑限于篇幅，这辑专以“折东”为主。

3、由于翻译水平和印刷上的原因，本辑除必不可少的地名、人名加藏文外，其余概以汉文译音书之。

4、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，热忱欢迎各界人士提出补充和订正。

5、本选辑对来稿可以加以摘录，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凡例.....	
前言.....	
漫话康定.....	(1)
对康定县境内水电建设的展望.....	(1 9)
康定古刹娜姆寺.....	(2 7)
金汤区历史沿革概况.....	(3 1)
康定和平解放见闻.....	(4 0)
古老的“罗罗会”.....	(4 5)
鱼子石淘金回忆.....	(5 1)
康定县旧商会.....	(5 4)
曾司令金汤铲烟亲历记.....	(6 5)
末代明正土司和他的三个儿子.....	(7 2)
鱼通土司的兵制.....	(8 0)
鱼通土司的由来.....	(8 2)
割山头不如割官头.....	(8 3)
一个远征军的回忆.....	(8 5)
康定皮革社研制栲胶生产的情况.....	(8 9)
世界上最低的工资—每月一元.....	(9 2)
德泰合的兴衰.....	(9 4)
炉城陕帮知名商号表.....	(1 0 1)
1 9 0 9—1 9 1 2 炉城年进出口商品大概表.....	(1 0 3)
格达活佛荐我到延安.....	(1 0 5)
炉城四宝赞.....	(1 0 8)

漫 话 康 定

黄启勋

一、两汉时与古牦牛县的关系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统一天下后，将我国原来由大小部族各自占地为王的奴隶主分权统治，改由中央集权的郡县制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在蜀郡（四川盆地一带）的西北、西南边境地区设置了湍氏县（松潘境）、青衣县（芦山境）、严道县（荣经县）。秦朝版图已包括有邻近我州的今阿坝州及雅安专区一带。

两汉时，为加强对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，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派司马相如为使臣，出邛徕，过雅安、汉源至西昌一带，《蜀鉴》说“相如还报时，邛_竹君长闻南夷得赏赐多，欲请吏”。司马相如也建议“邛_竹、冉龙近蜀易通，为置郡县，愈予南夷”。於是汉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，“建节往使，因巴蜀吏币物以赂，西夷皆请为内臣，除边关益斤，西至沫（青衣江）、若水（雅砻江）。”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四郡，其一为沈黎郡，该郡辖领四县：牦牛县、严道县、青衣县、徙县（天全境）。武帝天汉四年（公元前97年）废沈黎郡，改置西部都尉二“一治牦牛，主外夷，一治青衣，主汉民。”

“牦牛_竹”和（_竹都）二词，最早出现在西汉史册，后多种史籍考证注释论断，_竹都为今雅安专区的汉源县：《史记西南夷传》说“自徼（越西）之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徙、_竹都最

大。“《蜀水经》注释说“清溪县（汉源境）古髦国也，周武王伐纣，髦人从之，后为西夷都国。汉元鼎六年，诛苴兰，杀^竹侯，开置沈黎郡”。《后汉书、^竹都夷传》记述^竹人的风俗习惯是“其人皆尚左衽，言语多好譬类，居处略与汶山夷（指茂汶一带羌族）同”今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琳校注的《华阳国志》一书中，也论断说“^竹都，部族名。为牦牛羌之一部份，主要分布在今汉源、石棉、冕宁、盐源、盐边等县。汉武帝开置沈黎郡、治^竹都（即牦牛县）在今汉源”。

《华阳国志》校注对“牦牛”一词的注释是“牦牛、本牦牛夷之地，在邛崃山表”，《蜀水经》说“邛崃山今名象鼻山，俗呼象岭。云，武侯征蛮之道，盖象、相音讹而付会也”，《方輿纪要》记载“牦牛县在黎州千户所南。牦牛故治当在今汉源县南大渡河南岸之大村堡一带”。^竹可见都是牦牛县。

牦牛县的区域疆界有多大呢？据《华阳国志，佚文》所载：

“牦牛，牦地也，在邛崃山表……，有鲜水、若水……”，《水经注、若水条》说“若水、东南流，鲜水注之”，鲜水即我州境内的鲜水河，为雅砻江支流，其源自我州北部，经炉霍、道孚流入康定塔公区称力丘河，又经营官、沙德区至雅江，流入雅砻江。所以可推论古代牦牛县的西北边界，达到了大渡河以西，鲜水河，雅砻江以南，其地区包括今之汉源、石棉、泸定、康定、道孚、九龙及雅江东部。因此，康定在两汉时期，从疆域概念上说，是属古牦牛县的辖区。泸定县文史编辑的《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》一文中也谈到“原属沈黎郡二十一县（包括今泸定、康定、雅江、道孚、与九龙、木里、盐源、石棉、汉源、雅安、芦山、宝兴、天全、荣经十四县地区，在天汉四年罢郡后，青衣、涉、严道仍还蜀郡。大^竹）今雅砻江下游，泸宁营（以下河谷），定^竹（盐源）、^竹秦（可能不出今盐边、木里、九龙地境）三县划归越西郡。剩下广大地区，似皆交与牦牛王（驻

今定本雅乡)代管,一并隶属牦牛县”。这则材料,更明确地把康定和古牦牛县的关系作了肯定。

自汉武帝设沈黎郡,治牦牛县后,随着统治四川封建王朝的更替,沈黎郡的名称也累经变化:东汉安帝延光元年(122年)(牦牛县属蜀郡属国,蜀汉章武元年(221年)牦牛县属汉嘉郡,成汉时(303年)牦牛县又属沈黎郡,南齐时(480年)牦牛县属沈黎郡,直到隋朝时,据《寰宇记》记载:“汉源,本汉沈黎地。……隋仁寿四年(604年)置汉源县,以大川为名,治今汉源县南三十里汉源街,属雅州”,这是古牦牛县脱管却,更名为汉源县之始。

二、唐、宋之时属吐蕃管辖

唐定天下,对四川沿边少数民族地区,实行羁縻政策,建立羁縻州制度,宋亦承袭唐制。羁縻州是一种松散的行政管理制。在名义上属唐王朝统治,但掌握实际统治权力的乃是各部族土头酋长。羁縻州对唐朝一不上贡纳赋,二不当兵服役,只接受唐朝邻近地区正州、正县的监督,相互保持着民族间友好关系。唐朝羁縻州的设置,是以部族为单位,一个族部就可设一个羁縻州。唐太宗采取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,是以“中华既安,四夷自服”为指导思想的,因而不主张多用精力,以军事行动征服少数民族,而主张花精力于发展中原汉民族的经济、文化建设,促进与各民族间的融合。故《四川郡志》称“唐代抚夷之法,凡边疆与羌戎接壤之地,皆招抚其夷酋,使其内附,为之设立州县……谓之羁縻州”。

唐时,“川境松(松潘)、茂(茂汶)、维(理县)、雅(雅安)、黎(汉源)、戎(宜宾)、泸(泸州)诸州,皆密近边徼,与诸戎接壤,唐就各岩洞设立诸州”,其中之黎州所设羁縻州就有五十四个之多,“皆徼外生獠,无州,羁縻而已”。五十四羁縻州地理方位,四至边界,年久不可查,仅据谭其骧主编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 剑南道北部》地图标注的地域方位，康定为“会野州”。又据任乃强教授改证：“唐武周时，今康定城区及近郊地区为“上贵州”；鱼通河流域地区为“贵林州”。可见唐初置羁縻州时，康定已属黎州监督下的会野州上贵州、贵林州三个羁縻州了。

黎州所属各羁縻州，既无流官设置，游牧部族更无固定居住村落，和唐朝邻近正州关系，也极其疏淡。特别是到了唐贞观七年（633年）藏族著名历史人物松赞干布，在西藏拉萨缔造吐蕃王朝后，见唐朝由于对内镇压各路反王，边防空虚，兵力薄弱，遂率领吐蕃大军二十万，先后攻占松、茂、维、保（理县西北，诸州吐蕃统治势力所及，已达到大小金川梭磨河以北及大金川以南，大渡河流域地区。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汉藏和好，太宗以文城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，相约以邛州（邛崃）南桥为界。《旧唐书·吐蕃列传》记载说“吐蕃尽收羊同、党项及诸羌之地，东与凉（凉山）松（松潘）、茂（茂汶）、嵩（越西）等州相接，南至婆罗门，西又攻陷龟兹、疏勒等四镇，北抵突厥，地方万余里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胜，未之有也”。在范文澜著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三编记《通典》所载唐朝和吐蕃境相距离里数也说“松州北至吐蕃九十里，西北到吐蕃五十里；雅州西北到吐蕃野城五百七十里；恭州（松潘南迪溪营）北至吐蕃白岩镇七十里、维州东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、奉州（泸县）南到吐蕃野城八十里。自松州至奉州以西属吐蕃境”。当时四川西北、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岷江、雅砻江、大渡河流域属于唐朝松、茂、黎、雅等正州及所属的羁縻州，以及在我州西北部的“西山八国”等广大地区，实为吐蕃统治区。

宋朝代替唐政权后，疆域版图较唐朝缩小，在四川西南边境，仅到大渡河以南。《方輿胜览》载“大渡河于黎州、为南边要害之地。唐韦皋拒吐蕃，李德裕拒南诏，皆扼此水为险要。故议

者谓：“大渡河之不守，则黎、雅、邛、嘉（乐山）、岷皆抗”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83年）“王全斌平蜀，以归宋朝，议欲因兵威服以越嶲，艺祖玉斧划此河曰：“此外吾不愿有”。于是为黎、雅之梗边”。宋朝之把大度河西，包括康定在内的区地“置于度外，存而勿论”的真实原因是自己国力不盛，所以对大渡河以西的地区仍受吐蕃统治，不向吐蕃争夺边界，只采取息事宁人、和平相处，继续唐朝羁縻政策。连唐朝所定各羁縻州名称也未更变。康定仍为会野、贵林、上贵三个羁縻州。大渡河以西及今阿坝州各羌、藏族聚居的各羁縻州，依然受吐蕃管辖。但当时宋朝以碉门（天全）和黎州（汉源）为宋朝与吐蕃茶马互市贸易市场。吐蕃藏商赴蜀地贸易，大路是从康定木雅，逾雅加埂，经磨西面，翻摩岗岭，在沈村过渡，经飞越岭到汉源；小路从康定出东门，逾大杠岭，过冷竹关在烹坝渡大渡河，翻马鞍山到天全。所以，南宋时，康定已渐成为川藏交通的必经之路。

三、元明时的土司领地、

元、明之时，称唐、宋的吐蕃为西番，对四川西北、西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，实施土司制度。

元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，在中央设置宣政院，专管西藏，新疆等西南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事务工作。在地方则实施土司制度。“土”指本地土著，“司”指地方上的官吏，土司制度就是以土酋治理土民。元朝采用这种制度，其目的在于使“徼外诸番，悉入职方，土广人狃，欲分其势而杀其功，故来者辄授官。顺俗施化，因人授政”，使少数民族接受“知君臣父子之道，礼乐教化之事”，达以到“同于中国”的政治目的。

土司由元朝中央政府授职，因而土司对中央政府每年要缴纳定额赋税，军事上要服从征调，要遵守定期以方物土特产朝贡的规定。但土司在管辖地区内的权力，则俨然为本地区世袭的土皇帝，对该区人民能派遣差役，收纳租税，审理诉讼，设置土

兵，拥有生杀大权。在全民信教的藏族地区，土司家族还派出子弟学佛，主持喇嘛寺宗教事务，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。所以，改唐、宋设蜀縻州制为土司制，使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间关系，联系更为紧密，有利于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有利于民族间经济、文化交流、融合。土司制度被元、明、清历代沿袭使用，直至清末才实施改土归流。

《明一统志》载“元宪宗三年（1253年）始于河州）甘肃临夏）置吐蕃宣慰司都，并分设河州吐蕃乌斯藏宣慰司，管辖西藏地区；甘思宣慰司；管辖今我州道孚县以上北路地区；河州吐蕃等处宣慰司，管辖黎、雅、松、茂、碉门、鱼通（康定境）长河西（康定境）宁远（石棉境）宣抚司”。《元史》记载说：“元世祖至元二年（1265年）于四川徼外，碉门、鱼通、黎、雅、长河西等处设安抚司，隶吐蕃等处慰司都元帅府，由陕西行省管辖。《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》一文也说“至元六年（1269年）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，分兵三路，中路是他亲自率领，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，鱼通、长河西等土司和河的岩州（（昂州，今泸定岚安）土司率先迎降”，因木雅（今康定营官、塔公、沙德三区的旧称）瓦述族色巫绒土官（今康定沙德区色巫绒乡，迎降更早，于是元世祖并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三宣抚司为一个宣慰司，命色巫绒土官为宣慰司使”。到了元成宗大德元年（1297年）复“并碉门安抚司、运司改为碉门、黎、雅长河西、宁远军民宣抚司”，并设置长河西里管军招讨司、长河西管军万户府，鱼通路万户府，碉门鱼通等处管军镇守万户府和朵甘思（甘孜境）、哈达（道孚境）、理塘（理塘境），鱼通等地钱粮总官府”。

到了明朝，康定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三土司辖区史籍称为打箭炉（炉城）。元朝时治地在咱里（泸定咱里）的长河西里管军招讨司和长河西管军万户府，在明初改称长河西土司咱里土千户。《打箭炉厅志》记有：咱里土千户一员古天锡，始祖阿交，系鱼通人，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投诚。

授此职銜”。《泸定、档案县志》也记有：“咱里土千户始祖阿交，鱼通人，明洪武二年投诚。六年（1373年）授长河西千户所职銜”。但长河西土司阿交死后，传子甲马弯张，其人软弱无能，“因藏番据西炉（炉城），势弱愿匿为民”。长河西土司权力，为崛起于打箭炉木雅地区的，原明朝蒙古豪强土头篡夺，所以到了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“西番打箭炉长河西土官，故元右丞刺瓦蒙，自打箭炉入朝呈缴印信。次年（1383年）、西番打箭炉长河西土官故元右丞刺瓦蒙、复遣理向高维善及其侄万户若刺来朝，贡马及方物。四月，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司，以故元右丞刺瓦蒙为安抚使，并在木雅地区设都指挥僉事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明朝中央政府派礼部主事高维善巡视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等地。高回南京后上书明太祖，要求在泸定、打箭炉一带派兵设官，高说：“岩州、宁远（石棉境）等处，乃古之州治，苟拨兵驻守，就筑城堡，开垦山田，使近者向化而先附，远者畏威而来归”。但建议未被采纳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明中央政府得知长河西土司刺瓦蒙阴附建昌酋（越西）月鲁铁木耳叛变，并失朝贡。明太祖怒，但一时难于处置。到了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对长河西土司暗中勾结叛酋的不轨行为，才由礼部檄文长河西土司，声称“其或不悛，命大将将三十万之众入尔境、问尔罪”。长河西土司感到问题严重，连忙派遣使者入京朝贡谢罪，取得太祖谅解后，明朝中央政府不仅未治其罪，反而授长河西土司为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宣慰使。自此以后，长河西土司对明朝颇为恭顺。《康定县图志》载“明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征滇，征调夷马转输粮餉时，长河乡土司阿旺坚参聚十八路头目于此（打箭炉）设帐，供应伏马。后平定有功，均封为千百户之职”。长河西土司对明朝更是“世奉贡不绝”。长河西土司阿旺坚参被清朝时明正土司遵为先祖。

到了明朝末年崇祯年间，外临清军入侵，内有李自成，张献

应等农民起义，张献忠统领的农民起义军，并曾进军至雅安一带，川西北及青衣江流域百姓，为逃兵荒马乱，纷纷迁居大渡河河谷农垦经商，原来川藏茶马互市贸易中心，也由原来的汉源、天全、西移到打箭炉和岷州一带。这时在西藏、青海居统治地位的蒙古硕和特部固始汗，也借口藏族商人到打箭炉贸易经商人数日渐增多，打箭炉地方汉藏杂居，为管束往来贸易诸番，开始由藏王“派坐炉之管官”。明末之打箭炉已成为川藏交通枢纽，茶马互市中心，康巴地区重镇。

四、清代的打箭炉

清代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，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疆域的规模，分全国为十三行省。在中央设置理藩院，总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宜。属四川行省的打箭炉地区，在清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统治这个地区的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土司，缴呈明朝时颁给的印信，表示归顺。在原住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地区后，积极扶持黄教，在藏族地区兴建许多黄教喇嘛寺，给寺庙以宗教特权，干预政治，经营商业。所以在打箭炉地区，还存在和硕特部所委派的驻打箭炉管官的控制。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清政府始设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，通称明正土司。到了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《打箭炉厅志》载“恢复关山相岭，打箭炉一区，亦川省所辖”，对打箭炉地区的经营，列入了清政府议事日程。曾派四川巡抚于养志等封疆大吏，亲自前往打箭炉地区进行巡视考查，《清代藏事记要》载，“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理藩院议覆四川巡抚于养志奏：“臣等旨会同乌斯藏喇嘛管官等，查勘打箭炉地界，自明季至今，原属内地土司所辖之地，宜入版图。但番人籍管生居处多年，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，皇恩准行，应仍使贸易。番人之事，应行文达赖喇嘛，使晓谕、官遵行管理。关系土司之事，着土司管理，勿至生事。至打箭炉四至交接之地，该抚详查报部，编入一统治”。由于打箭

炉地区处于清政府册封的土司和西藏派驻炉城管官共治之下，在彼此权力争夺之中，并未做到“勿至生事”，在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发生“明正土司蛇蜡喳吧被喇嘛营官第巴昌侧集烈打死”事件，打箭炉地区被昌侧集烈军事占领。清政府一边指责西藏第巴等“纵放营官昌侧集烈将四川打箭炉内土司蛇蜡喳吧居住地方，恃强进行强占，渐次侵据河东乌泥、若泥、昂洲三处（泸定境）渐有窥视嘉庆、擦道之意（泸定境）。又因内土司蛇蜡喳吧漏言，遂致于死。种种妄悖，实难宽假”，提出要求说：“旨一到，将渐次侵占打箭炉及版图内土司地方，俱著退还。打死内土司蛇蜡喳吧之营官第巴等，即行解交”，一边进行军事部署，将化林营移防打箭炉，以资弹压。因西藏第巴等不但不遵敕谕，反而“甚为狂勃，将修路之官兵打死，拆毁偏桥，阻截官兵”，同时还在“五雅（木雅）等处抽兵”，进军烹坝（泸定境），“攻击官兵营盘”，事态扩大，清政府遂于年底派出四川提督唐希顺等，统率大军，兵分三路，平息昌侧集烈之乱，取得“杀蛮兵五千余人，斩磨西营官第巴昌侧集烈及大岗营官笔迭等”的军事胜利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唐希顺上奏“臣于正月十三日低达打箭炉、有商民喇嘛、番民等归顺。又有木雅头目错汪端珠等首先归顺”。在此时四川巡抚贝和诺奏请“打箭炉木雅一带，归顺番民一万九千余户，应添置安抚使五员，副安抚使二员，土百户四十五员，以专管辖”。清政府“从之”。因蛇蜡喳吧乏嗣，以其妻工喀承袭明正土司之职。原长河西土千户后裔古六七力恢复土千户职衔，改称咱里土千户，归明正土司管辖。鱼通土司仍隶雅州府专管，（光绪二十九年始划归打箭炉厅管理）。至此，打箭炉地区仅存在明正、鱼通、咱里三土司及四十五土百户，其中至今仍属康定县境者有：木噶（安良坝）、瓦七（瓦泽）、白桑（下柏桑）俄洛（东俄洛）、恶热（拉弄）、八哩笔巴（下马龙）、亚昌卡（铁索桥）、他咳（塔克）、索马龙（

色乌()、洛桑()、洛洼卡(六巴)、甲拉工弄(甲根坝)、吉增卡(木居)等。明正土司领地(含鱼通、咱里土司在内)，“纵横东西四百里，南北千五十里，共管土民六千五百九十一户，其边界四至，东至泸定桥，西至雅江，北至丹巴交小金县孙克宗，南至九龙交冕宁县的乐壤。拥有今日康定、九龙两县及雅江、丹巴、泸定、道孚县接壤康定的部分地区。

在平息昌黎集之乱后，清政府在打箭炉地区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权力。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清政府对打箭炉地区原设土司、千户、百户等未变外，又派出喇嘛达木巴色尔济、郎中舒贝、员外铁图等驻打箭炉、监督贸易，开打箭炉派流官之始。同时为了畅通川藏交通，方便军运及商旅往来，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经四川巡抚能泰奏请“泸河三渡口(大渡河)高岸夹峙，一水中流，雷奔失激，不可施舟楫，行人援索悬渡，险莫甚焉！兹偕提督岳升龙相度形势，距化林营八十里，山趾平坦，地名安乐，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划建桥，以便行旅”。清政府同意修建，次年竣工，康熙撰写《御制泸定桥碑记》，并移化林协千总一员，兵百名镇守泸定桥。(雍正六年正式设泸定桥巡检，管理桥务)。既方便交通，加强政治管理之后，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清将年羹尧奏请“派兵驻打箭炉，储运粮草”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年羹尧再次奏请“打箭炉之外中度渡口(雅江渡口)系通西藏要隘，不可无兵弹压”建议派兵，建立土城。雍正二年(1724年)年羹尧三次奏请“在打箭炉设官”。并多次要求加强对打箭炉地区的军事力量。但雍正认为“打箭炉之明正，理唐等土司、土妇及头目人等，归诚内附数年来，谨守住牧”，特别赞扬“四川各番部中，明正一部最为恭顺”。主张“治天下之道，乱则声讨，治则抚绥，理之自然也”。对派兵驻防要求，都未同意。直到雍正七年(1729年)清政府才把打箭炉地区纳入地方行政建置，设打箭炉厅，移雅州府同知驻打箭炉，隶属雅

州府。这时恰值西藏七世达赖喇嘛被清政府移住他达城（宁远府惠远寺），为了护卫达赖安全，始建立泰宁协，先后建立泰宁中军都营（驻泰宁城）、德清守备营（雅江渡口）、宁安守备营（道孚灵雀寺）、吹音堡守备营（泰宁吹音堡）、阜和守备营（打箭炉城）。打箭炉厅设置次年（1730年）开始修设炉城城垣，《打箭炉志略》记“查打箭炉原设三门，东门大卡系进省通衢，南门公出卡系赴藏大道，北门雅拉沟沟通各苗蛮小路”。从此，打箭炉厅治所，官衙兵营相继建设，汉、藏、回等商民住户日益增加。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明正土司也由木雅住地迁居城内，兴建明正司衙门及安置其旧属十八家土头庄房，作为他们在城内支差侍贡时住宿之用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有法国传教士丁主教来打箭炉城区设立天主堂（今州工会处）、修道院（今民干校处）等，为外国人进住康定开了先例。

打箭炉厅建置后，明正土司在打箭炉同知节制下，与流官相处关系融洽，如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明正土司因从征瞻对（新龙）卖力，清政府“免打箭炉从征番众贡赋两年”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主管理藩院的皇亲果亲王允礼，经打箭炉至惠远寺，经办七世达赖返回西藏事务时，曾题赠“武显将军”匾额给明正土司。《清史稿》中曾多次记有对明正土司褒奖之词和奖赏之事，如称赞明正土司“向属恭顺”，对完成清政府下达任务“竭力用命，日夜不遑”。是旷世远方宁谧，遐迩同风，无有异志；永为威世良民”。在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因随征金川有功，皇帝旨谕云“明正土司甲勒参德沁，带领所属人等，奋勉出力，著加恩赏戴花翎，并赏给佳木拜屯名号，以示奖励”。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明正土司甲木参诺布尔，随征廓尔喀有功，赏戴花翎”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明正土司甲木参加领班“进京恭万寿，赏戴花翎。道光、同治年间对瞻对土头工布朗结用兵时，明正土司甲木参龄庆亦派兵会剿”，直到清

未改土归流前，明正土司家族是一贯忠于清朝的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清政府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势力对康藏地区的日益入侵，清政府为了“宁康境、卫四川、援西藏”，进一步加强对川边特区（今甘孜州和昌都地区）的建设，改打箭炉厅为直隶厅，改隶建昌道管辖。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委派建昌道尹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，采纳其经过六事（屯垦、练兵、设官、通商、开矿、兴学）建议，对川边特区进行改土归流。

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废除土司制度，进行改土归流，对加强中央集权，巩固多民族共建的统一的国家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促使少数民族地区由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，向封建社会发展是有益的。故清朝取代明朝政权后，即大规模地开展改土归流工作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云南总督鄂尔泰等即奏请在云、贵地区进行改土归流，并将具体措施规定为“增设营汛，盖造衙署，清理钱粮，编造户口”。雍正七年在川边设打箭炉厅时，即进行了土、流并存的双重设治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四川总督鹿传霖曾奏请在川边特区施行改土归流，清政府慎重其事，认为条件尚未成熟，未付诸实行。从三十一年委派赵尔丰为边务大臣从事经边后，赵氏以推行经边六事为主体，陆续落实措施，到宣统三年（1910年）大体分三个阶段，初步实现了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，并协同其继任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，规划了建立西康行省筹划工作。

1、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（1905—1907年），以解决巴塘、“风全事件”为开端，杀逐巴塘，理塘土司，设巴安府、理化厅、稻城县、定乡县。

2、从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（1908—1909年）以解决德格土司争袭土司职衔为由，收缴德格、高口、林、春科等土司印信；改打箭炉为康定府，设河口县等。

3、从宣统二年至三年（1909年—1910年）赵尔丰升任为四川总督。协助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，在办理收回赔款事务的同时，收缴了孔萨、麻书、白利、东科、朱倭、全科、巴底、巴旺、丹东、明正、鱼通、咱里、冷边、沈边、崇喜、毛垭、曲登等土司印信。并立即委派设治委员，接管地方事务。

在进行川边特区改土归流中，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曾会同赵尔巽奏请在川边特区立“两道、三府、三州、十二个设治委员”。其中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，隶康安道。宣统三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，奏请建设西康行省，但时隔不久，武昌起义，宣统退位，建省之议，未成事实。

打箭炉明正土司被改土归流的情况，末代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（甲宜斋）之孙嘉拉、降泽口碑资料记述说：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，清廷委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。到巴塘平息杀钦差事件。他一到巴塘杀了不少的土司头人和不少的藏民。当时甲宜斋十分畏惧，带着部份人逃到塔公一带藏匿，留弟弟在炉城迎接赵尔丰。赵返炉城后因听信属明正家四十八家头人之一的桑卡龙、阿甲呷绒丁真的谗言，对明正土司生疑，于当年冬季突然逮捕了甲宜斋之弟弟，大年十五在炉城南门杀头示众，收缴了明正印信，改打箭炉为康定府。清兵驻进土司官衙后，大肆劫掠财物之后，又放火把官厅烧为灰烬。这时甲宜斋还流亡在乾宁（道孚境）等地。直到民国六年之后，被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诬通夹巴（土匪），被捕后越狱逃走时被发现，服毒身死。末代鱼通土司甲安仁，在民国时期，仍勾结康定县官府，在鱼通区闭关自守，继续享有部份土司特权。解放后，不接受人民政府的争取，勾结国民党特务，发动鱼通叛乱，被解放军围困在高山自毙。

打箭炉直属厅改康定府后，治地包括原明正、鱼通、咱里土司领地，复设泸定、丹巴、道孚、雅江、九龙五县，隶属康定